

# 中国现代哲学的 创生原点

熊十力体用思想研究

张光成 著



新  
生  
代  
学  
人  
丛  
书

新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中国现代哲学的 创生原点

熊十力体用思想研究

张光成 著

新生代学人丛书

新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生原点:熊十力体用思想研究/  
张光成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ISBN 7-208-04168-7

I. 中... II. 张... III. 熊十力—哲学思想—研究  
IV. 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970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王晓阳

·新生代学人丛书·

**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生原点**  
——熊十力体用思想研究

张光成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71,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7-208-04168-7/B·327

定价 18.00 元

## 序

在我国现代哲学史上,出现了许多大师级人物,熊十力为其中之一。他的思维能力,渊博学识,立论勇气,为学界所共仰。他不只是一位著名哲学家,还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的一位重要的开山人物,因而在中国现代哲学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张岱年先生曾评论说:熊氏一生专注于探讨宇宙及人生的本质,其学术思想的深沉渊奥,决不亚于海德格尔。也许由于这个缘故,他的哲学思想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垂青与关注。从目前看,研究熊十力哲学思想的文章与著作已属不少。

然而,如张光成这样,以熊十力体用思想为切入点,深入开掘并全面阐发熊十力哲学思想的内在结构及现代价值,尚不多见。

这本书的特点,照我所见,有如下三点:一是立论坚实,二是视角独特,三是发挥大胆。

一篇文章,一本书,是否能在学界站得住,并占有一席之地,首先在于著作中反映的理论观点是否坚实与牢固。然而,要能做到这一点,必须对该所论述的著作家的独特性格有所把握。《吕氏春秋》里在说明掌握人的特性的重要性时,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古代一名大力士(乌获)去拉牛尾巴,气力用尽,牛尾巴被拉断,牛还是没有被拉动,因为向后面拉牛尾巴违反了牛的习惯;反过来,一名五尺之童牵着牛鼻环向前走,牛却肯服服帖帖

地被牵向要去的地方,是因为向前拉顺了牛的习性。

其实,做学问也是如此,面对某一位哲学家,只有切实地把握这一哲学家学术思想的特殊性格,然后去仔细挖掘,才会触摸到这位哲学家学术思想的真正宝藏。张光成在研究熊十力哲学思想时,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尽管熊氏哲学极为丰富,含有体用论、本心论、翕辟说、返本之学、“性量分途”等诸多侧面,但在不少学者(也包括张光成)眼里,他的体用论思想乃立论之基石,是灵魂之所在。本著作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用尽全力打开缺口,仔细搜索,对熊十力体用论思想的源头、演化及理论归宿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梳理,才使得这本著作在读者眼里有一种自成格局和浑然一体的感觉。

视角问题,也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

众所周知,对于熊十力,很多学者是从现代新儒家的角度去研讨的。熊十力“三大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则更不待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条不错的思路;但是,任何一个建立了自己哲学体系的哲学家,都具有多方面的特征与品格,学术研究不可能按照一条线索,一种规格去进行。本书的作者在熟读原著的基础上,敢于独辟蹊径,不是从新儒家的角度,而是从纯哲学的角度,将熊十力作为在世纪之交仍有生命力的原创性哲学家去研究,着力挖掘熊十力哲学体系内部构造与学术底蕴,阐发其哲学思维价值,并凸显其对于东方哲学的新贡献。这一学术研究取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今研究熊十力思想的不足,而且从发展眼光看,也具有开拓和创新的意义。

我国古代思想家有言:闻道有先后,学术有专攻;又云: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未必不贤于师。从学术发展的规律说,后来者补前人不足,或将前人思想发扬光大,是合乎常理的事。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作者不囿于体用论本身,而是伸展开

来,探讨它的学术价值与现代意义。

作者认为:熊十力所创立的举体成用、大用流行的体用宇宙观,其价值在于重挽“大易”洪流,复兴原创期中国文化,清扫两千年专制造成的中国文化的颓废萎靡之气,在华族生命的原生根芽上承续故有文化,并使之与现代社会接轨。

作者又认为:熊十力体用论思想之可贵,在于他作出一种示范:即作为一位中国学者,固然应重视吸收其他民族的长处,但不可轻视自己民族。由是,“本源在我,自本自信”是任何一个民族得以自立的根本要素;而这一点,无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最好的精神资源。

作者还认为:熊十力的体用思想,不只在现代社会,即使到后现代社会,也不丧失其价值。原因在于:现代社会里技术因素的过分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被降格为庞大社会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种人与物关系的颠倒,使人对自己的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而熊十力则告诉人们:从根本上说,量智从属于性智、科学从属于哲学,一切智从属于根本智,即认为德与智互为表里。这一观念克服了重智轻德,重物轻人,重科学轻哲学的倾向,把人的精神追求,精神价值重新提升到应有地位。这一思路,正好同对于现代社会进行反思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认识相契合。

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对熊十力体用思想现代意义的极好阐发。

毋庸讳言的是:由于熊十力学术著作的文字古奥、言语晦涩,增加了对他的思想研究的难度,也使得许多学者面对他的著作望而却步,张光成不是这样。他是以敢下地狱的精神一遍又一遍地研读熊十力先生原著及相关的研究者的著作,在他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为钻研一个问题,几乎达到了

#### 4 / 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生原点——熊十力体用思想研究

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地步。正是由于他不畏艰险,苦心研读,终于能在某一时日得意忘言,豁然贯通,然后将这些研究成果跃然于纸上,使人一读便朗然于目。这种刻苦扎实的学风同时下一些人研究学问急功、浮光掠影的坏学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张光成所著《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生原点——熊十力体用思想研究》一书即将付梓。我作为第一读者写下上面一些话,以表祝贺并作纪念。他正值年富,也期望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张 文 儒

2002年2月中于北京大学

# 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生原点——代自序

## 一、熊十力哲学的性质与历史地位

### (一) 古今之交,民族旧学术、旧学脉的转捩者

熊十力自称为儒家,又自言称其为新佛家亦未为不可。又说,吾亦佛亦儒,非佛非儒,吾只是吾。那么,他是中国旧学术的余绪呢,还是新的民族哲学的开山?他是在哲学史的中西之争、新旧文化之争中认定的顽固派呢,还是在中国历史空前巨变的时刻,中华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显然,这是认识熊十力哲学的关键问题。

熊十力其自称学佛焉,归儒焉。所以有佛教改革家之说(冯友兰),杂糅儒佛之说,尤其近二十年来新儒家学说更是长足发展。熊十力几乎无争议地被视作了为新儒家立基的人。熊十力哲学,言儒言佛,看去无非旧学余脉。然而,将旧学术彻底地批判改造,将其营养纳入新学术框架,其立说基之于新的学术视野——哲学,则是无疑的。

应当看到:不是儒家,也不是新儒家,更不是佛家,而是“治哲学”(熊自言之志,梁漱溟甚不以为然,但却是他的这一治学方向的印证)，“究元”才是他的真怀抱;“吾亦佛亦儒,非佛非儒,吾只是吾”的不依门径,苦究本现矛盾的深刻用心,“平章华梵,低昂中西”、“治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于一炉”的原创精神,才是

他的真实面貌。

熊十力是民族旧学术、旧学脉的转捩者。他不是洋学的贩夫,不是比附中西之人,而是以新学术之框架阐扬中华文化精髓之人。所以,从这里说,唯熊十力才是在世界哲学语言构架基础上释扬民族文化精粹的第一个现代哲学家。他的哲学是一种追根究底地重考中西印学术,从根本上找到它们融会点的哲学原创。因此,实质地看,熊氏体用哲学就是中国学术旧学脉打断,现代民族哲学诞生的明确标志。

由此,我们就可以说清熊十力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他是首要的一位以现代哲学语言阐明民族哲学哲理的人。是一个以现代哲学之框架阐发中国学术精华之人。他不是旧学脉的继承者,而是在中西文化激荡中以回答时代诸大问题为根本目的的哲学原创者。他彻底翻检中国学术史,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在现代哲学语言的平台和社会文化学的平台上,进行的是民族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哲学的民族化的理论创造。

这一点,我们对照于同时代的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马一浮、胡适就更清楚了。在此,我们主要将熊十力哲学与冯友兰哲学作一对比。

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就提出“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的问题,其实际意味恐怕就是,他认为,《中国哲学史》对“中国的哲学”的问题仍是没有解决。冯友兰受新实在主义的影响,受共相说的影响甚深,这不能不说是他偏爱程朱理学的一大原因。这直至在解放后提出的抽象继承法中亦可以看到其影子。且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对二程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的区分,也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哲学的根基在于西方哲学,在于新实在论。而况,就中国哲学史的阐述说,冯氏当

然是有其从史客观叙述之一面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在这客观的一面中,表现了冯氏对中国哲学史的无批判性——他是以道统说自居的;其“贞元六书”从理论上说不外新实在论和宋明理学的贯通,其文化倾向虽不是“照着讲”,但毕竟是“接着讲”,这比较清楚地表明了冯友兰哲学对中国旧学术缺乏批判意识——当然由此也就谈不上多少理论的原创性。

概而言之,冯友兰哲学是“哲学在中国”的哲学。是“接着讲”的中国哲学——也就是没有斩断旧学脉脐带的哲学。它是增加了新实在主义西化味道的中国旧哲学的延长。从上述看,谓之新儒家,未为不可。

当然,冯友兰不仅仅是讲道统作为政治哲学。他以坚持中国哲学之命脉以为之继,这也是他的理论在今天仍有价值的原因。

我们可以进一步这样来对比冯友兰与熊十力:

冯友兰的学术根底是在新实在论。虽时时流露以西方观念解析中国哲学的痕迹,但同时他又以继道统为志。其在现代成为宋明理学的阐扬者和以宋学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学脉,正是实现这二者的统一。与此不同,熊十力接受西方哲学的语言和学科分类,但对西方哲学的方向与方法皆有批判;熊继承中国哲学的精髓,但同时又是中国旧学统的批判者和转捩者。

在冯友兰那里,中西互解,似乎东学西学正相互印证。一个观念,似乎看不出中也看不出西,既然学术的根底是在西学,以西学解中学的痕迹在其著作中时有所见。而在熊氏那里,西学是比照对象,常常以西方之短而正衬托出中国哲学之优越。

第三,熊氏的创造性在以西哲框架历史性地把中国哲学核心理念梳理成系统。冯氏在扯平二者,使二者皆显不出明显特色。这正是中西哲学对接中的历史经验教训。

熊十力哲学的原创性也可以在与其它学者的比较中表现出来:

金岳霖,其著作作为《论道》、《知识论》、《逻辑学》。前者,意在阐发中国元学之道:出入式之能,浩浩不竭,“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上去了。”<sup>[1]</sup>但其宇宙中无尽的“式”,又明显地表现了柏拉图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印记。《知识论》试图以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思想补正西方哲学认识论之偏颇,有平章中西之志,但客观地说,其持论公允有余,创新不足。也就是说,他在融会中西上有所贡献,但毕竟对中国哲学精义阐发无多。

贺麟,主张以西解中,同时亦需以中解西。这是深有见地的观点。尤其后者。惜乎,未能有深阔的著作出现。

熊十力,其地位在这二十年来的凸现与扬升,亦自是历史之必然:他是中国文化命脉的固执的坚守者。是自觉与西方哲学一比高低的人。他与陈康<sup>[2]</sup>,可谓哲学界最有傲骨之两中国人。

## (二) 中西文化结合模式的探寻

看来,中西文化的汇流,中西哲学的颉颃,基本有三种模式:一是立足西学,以西解中,甚至于在哲学上也全盘西化。这对于中国哲学脱离古代朴素形态而走向哲学理论的世界化和现代化,当然是有益的。二是立足国学,不管西学在中国已经赢得了多少人心,但仍以继承中国固有学术传统为志。这对于保存中国文化的固有之种相和传统学脉,其功亦存焉。三是,认识到在文化世界化的条件下旧学脉之不可继,亦认识到全盘西化之不可行,从而毅然打断旧学脉,在中国哲学的本根上,吸纳中国哲

学的真正精华,融会西方哲学的时代性先进因素,打通中西印,在中国哲学的源泉理念上熔铸中国哲学,在对中国学术的革命性改造中使之获得新生,以学术革命而继学术薪传。以中国哲学之原生种子而培于世界现代哲学之沃土,以使之更根深叶茂,以无愧于五千年文明,并以新的面貌立之于世界文化之林。

对于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以上三种模式都是有价值的。但是,不革新,旧学脉何其可继?一颗民族心、亦即最深层的文化理念不能丢,全盘西化又如何能全盘?这样,第三种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正日益显出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这不但因为它固守了中国文化的种芽,为中国人树立着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因为只有这一模式才能使中国哲学对世界真正有所贡献。

经过认真思考就不难看出:熊十力哲学正是这第三种模式的代表。

### (三) 体用论所以作之必然

19—20 世纪,是西风烈,吹彻中华大地,把中国由一个历史上长期强盛繁荣的大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期。这先是从惊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然后到被迫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西方社会体制制度的先进,最后更发现,在西方先进的体制制度背后更有着相应的文化底蕴,这些社会理念才是支持着整个西方社会的东西。这样,陈序经、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思想就提出了。就连自称“佛家”、推崇儒家的梁漱溟也感叹宗教、政治以至音乐、美术“样样不如人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似乎一切西方的文化思潮、思想主义无不蜂拥而入。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当然以科学的胜利告终了。中国最著名的两个大学——北大与清华各自成了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阵地。20 世纪 20 年代杜威和罗素的来华讲学,则更是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影响深

远的作用。

然而,这时的中国哲学虽也在挖掘自己的宝藏,但在总体上仍保持着它的陈腐:墨学被发掘出来了,但不过风靡一时,不几年就为人淡漠了,其影响甚至不如佛学。而佛学,在辛亥前后也曾做过革命的思想武器,但辛亥革命失败,说明了佛学也成不了真正的革命思想武器,所以也就只能退而隐,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就微乎其微了。这是国难的时代,主张“无为”的道家难以参其言。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国学儒家学说了。这时,出现了一些死守儒家旧教义的人物,如辜鸿铭等等,这除了说明旧学之顽固无救,其他说明不了什么。而时间稍后,确乎出现了一批以后被称为新儒家的人物——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等等。而这些新儒家的人物对儒家或者未见其新,或者以为融会于西学,或者以为会通了佛学就是新的了。前者如梁漱溟、马一浮。这大概就是当时国学研究的状况了——它没有提供更多的新东西。

那么,西方人或从西方哲学观点来看中国哲学的中国学人,中国哲学在他们心中是一个什么面目呢?对此,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言当时情况:形而上学亦称玄学。或者,当时也有人称其为道学。先看“玄学”的称谓:玄学是客观之学,是对世界的认识吗?看来不是。玄学是明确的主观知识,或获取主观知识的主观方法吗?看来也不像。从人类的知识体系说,它既不是 *Weltanschauung*(世界观),也不很像就是 *philosophy*(哲学)。而从哲学的严格内容来说,它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既不是逻辑学,也不是伦理学。再看“道学”。从这名称和它在学术史上的作用,它常常也就是山林隐逸、修养心性之学,在人类客观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也似乎是若有若无的。

——从以上,我们就可以一窥当时国学的概况了:它的确是

平庸陈旧。它的确不是西学的手。在西学的面前,尤其在西方哲学的面前,它让中国人自愧,以为在文化上低人一等,以至于认为中国无哲学——不但一般人这样认为,就是胡适,在掌管北大文学院期间,就主张只设中国思想史课,而不设中国哲学课。

上述情况说明了:

第一,当时的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缺乏真正的、批判性的了解。对它的真价值所在缺乏真正的了解。

第二,当时学术界的状况说明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无生气。非儒即道。非道即佛。对时流无回应,孤芳自赏,陈陈相因。

第三,这样的状况也就说明了,学界少有人能突破儒、佛、道的传统学脉界线,更没有人认为中哲能与西哲抗衡。当时学界的情况,确实是有点像“言必称希腊”。甚至于,许多人认为哲学是西方的学术,中国是没有哲学这门学问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梁漱溟了。

造成这种情况,当然有认识上的原因。然而,尖锐一点说,这是否与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与当时的殖民地心态有关呢?

撇开当时的具体因缘不谈,解决上述问题,可以说是体用论所以作的深层原因。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五千年灿烂的文化,难道只因为近代的落后,就事事不如人吗?中国文化真的就是无“元”的文化,中国数千年来是否就是没有文化理念的国家?在“元学”上——也就是在哲学上,中国真的就不能与西方相抗衡,相颉颃?

熊十力作体用论,其根本原因就是欲以东方学术对抗西学。

熊十力明确地说:他要以东学对治西学。这一“对治”,当然是哲学领域的对治。我们看一看他这一工作的内容:

哲学的本根、哲学最悠久的历史无疑就在于本体论。<sup>[3]</sup>人类之所以能整体地把握世界,之所以能以万变中不变的眼光,以“实体”、“绝对”的范畴来概括世界的实质,就在于本体论是哲学的深固不摇的领域——即使是在近现代西方反动潮流强劲的情况下。

“中国哲学幼稚”、“中国哲学无系统”,甚至于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的依据关键就在于:中国哲学没有体系宏大,论证严密的哲学著作。中国的哲学著作又太重人文伦理,轻视对世界整体的纯理性的分析把握;而这一缺陷又主要表现在对宇宙观的比较漠然,阐述零散,理性论证不足上。这当然就导致了中国哲学乏本体论思想的普遍看法。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表面看来是,而精研深思中国哲学的熊十力则以为非。对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他进行了全新、系统的卓越论证:

首先,他论证了中国哲学是有“体”——即本体的观念的。他认为,本体一词,并非西方哲学所专有。中国哲学的“道”、“太极”、“易”,以及印度哲学的“无”、“涅槃”等等都是体。这些东方哲学的概念,与西方哲学本体之概念内涵上并无不同:它们都是对世界根本性质和根本存在的观念表达。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体用论》、《原儒》等著作中都作了大量的论述,他有力地说明了,东方哲学不但是有体的,而且更是以万华融即、万有同源为之文化特征的;东方文化不但有其显著的本原意识,而且其人生观,也是以宇宙的大本大原为皈依,以之为生命的力量源泉。本著认为,熊十力的论证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周易》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代”,到《管子》的精气说,从老子的“道”,孟子的“求其放心”,到宋明理学的“理”,且更有佛教哲学对涅槃寂静的追求,东方哲学对体的观

念的追求和认同,虽与西方哲学不同,但无疑是东方哲学和东方文化的重要内涵。

接下来,熊十力阐发了东西方“体”的观念的巨大不同:

熊十力说,西方的本体观,事实上是把本体作为了隐于现象背后或高居于现象之上的兀然实体。这样的实体是“不动不变”的,而与这样的实体对应的现象则是变幻万千,虚幻不实的。这样,或者不动不变的本体难以产生出现象;或者既承认气象万千的大自然的真实性,那么,上述所言兀然不动的本体的存在与现象界的统一就成为问题。这就是西方哲学难以解决的本现问题。异之于是,中国哲学则从不把体看作僵死的存在,而是从体向用的转化和体与用的统一来阐发本体问题。这就是熊十力充分阐发了的中国哲学的体用理论。

熊十力论证道:在中国哲学——主要是易学哲学,认为本体不是僵固不变的,而是有内部矛盾,有内部相反之机的,因此,本体是流行的。

于是,举体成用,大用流行。本体转化为殊殊的大用,亦即转化为纷纭变化的大千世界。这样,用以显体,体以用存。本体论与大用论就统一起来,大用论也就是本体论的实际存在形式。

本体化为大用,是因为事物内部相反之机的作用。熊十力以易学的语言言之,就是翕辟生变:翕,即宇宙中凝聚的势用;辟,即宇宙中开辟的势用。翕与辟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为辟不断地战胜翕,使宇宙不断地分化、更新,使宇宙表现为一个永远充满着生气与活力的宇宙。

大用为本体之表现:人心亦为大用之重要侧面。以反求自证,知吾之心体即宇宙之体。以宇宙本体之复杂性,亦可知宇宙本体亦包括心的因素,此即熊十力所谓“本心”。宇宙心体为自我之心的真本原。以此自我真本原而能明心见性,以明心见性

而见人心之宏富,人道之伟大。以开物成务、参赞化育而见人心之大明,本体之我有,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天人合一,即人即天。

文化碰撞,自己要不想成为牺牲者,如果自己不是懦夫而对外人表现出独立性,这就需要拿出自己的东西来——充分显示本民族文化的精华。西学袭来,中国人在文化上也应拿出自信心,如同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拿出自信心。著者认为,这正是《体用论》所作之原因。《新唯识论》、《体用论》,熊十力所创立的哲学,正是要激扬中国精华以应对世界。

这一点,坦言之,他人并未做到。而熊十力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当时这并不为学界所理解,但是,以后就渐渐改观了:从上世纪40年代,直至现在大陆港台学者、世界范围的哲学家,都承认熊十力是一个近现代最杰出的民族哲学家。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国哲学需要在应战中发展的历史时刻,熊十力哲学表现了他在民族哲学发展史上关键性的地位。

体用论的贡献可以这样具体言之:

体用论说明了中国在文化、文明的理念上是有体之国——是有深邃久远的文化理念的国家。

体发为用、用现为相,说明中国不是一个规行矩步、沉溺于形而上学的“礼仪之邦”,而是一个注重现实世界的具有浓重现实主义思想的国家。

体用论认为实体内部有复杂性——具体而言,翕辟生变,精神与物质之无穷搏战也。这一搏战,说明了中国人在开物成务、化成文明中也是精进不已,健行不息、常作狮子吼的国家。

不难看出:他的体已不是宋明理学之体,他的用也已不是宋明理学之用,他的体用一元,也已不是佛儒旧学之体用一元,而是以现代哲学语言对时代精神的阐发;是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字